

# 从目的翻译理论视角看庄子《逍遥游》译文比较

曾辉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福建漳州, 中国

**【摘要】**庄子《逍遥游》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瑰宝, 其英译研究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框架, 选取沃森(Burton Watson)与冯友兰的两个典型《逍遥游》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探讨两位译者在基本哲学概念、寓言故事及文化负载词等方面的翻译策略差异。研究表明, 冯友兰以哲学学术阐释为主要目的, 采用语义翻译和大量注释, 注重概念准确性; 而沃森以文学经典传播为主要目的, 采用交际翻译和“厚翻译”策略, 注重可读性与接受效果。这两种翻译路径分别适应了不同的读者群体和传播需求, 证实了翻译目的在典籍英译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为中国哲学典籍外译提供了多元思路。

**【关键词】**《逍遥游》; 目的论; 哲学典籍英译; 沃森; 冯友兰

## 1. 引言

庄子《逍遥游》是《庄子》全书的纲领性篇章, 以其奇特诡谲的想象、变化多端的文笔、浪漫诗意的语言以及深邃严谨的思想, 成为先秦说理散文的瑰宝, 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1]关于庄子的哲学思想, 冯友兰先生曾概括为: “游于逍遥; 论以齐物。超乎象外; 得其环中。”这十六字精辟点出了“逍遥”在庄子哲学中的核心地位。[1]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 如何有效翻译并传播如《逍遥游》这般富含哲学深意与文化特质的典籍, 已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

迄今为止, 《逍遥游》乃至《庄子》全书已有多个英译本问世, 包括冯友兰(1948)、沃森(1968)、葛瑞汉(1981)、汪榕培(1999)等知名译本。现有的翻译研究多从隐喻理论[2]、哲学意象转换[1]或厚翻译策略[3]等角度对各类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这些研究极大推动了古典哲学英译的进步与发展。然而, 从目的论视角系统探讨冯友兰与沃森这两个代表性译本的研究尚不充分。冯友兰作为中国哲学家, 其译本带有深厚的学术阐释特质; 而沃森作为西方汉学家, 其译本则倾向于文学性与可读性。两者因翻译目的不同, 在翻译策略上呈现出显著差异。

基于此, 本文以德国功能学派目的论为理论框架, 通过对比分析冯友兰与沃森《逍遥游》译本在基本哲学概念、寓言故事及文化负载词等方面的处理方式, 探究翻译目的如何影响译者的策略选择, 以及不同翻译路径在典籍外译中的价值与局限, 以期为国学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提供新的启示。

## 2. 文献综述

《逍遥游》及《庄子》的英译研究已成为典籍翻译领域的热点话题。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 学者们关注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庄子》翻译研究。如唐嘉俐从隐喻理论视角出发, 对比分析了沃森、葛瑞汉等四位译者的《庄子》英译本, 研究发现不同译文在概念层面、语法层面和寓言层面均体现出共性和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源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受到生活体验、知识细节、认知加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另有学者从哲学意象传达角度切入, 如《〈逍遥游〉中哲学意象的英译研究》一文将《逍遥游》中的哲学意象分为自然景物、动物植物、历史人物和神话形象四类, 并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意象的五种翻译策略: 音译加脚注、音译加文中注解、意译加脚注、意译加文中注解以及中西意象对等英译法[1]。

另一方面, 学者们聚焦于具体译本的对比分析。王敏比较了冯友兰与汪榕培的《庄子》内篇英译本, 发现冯友兰的翻译属于语义性翻译, 注重原文哲学意义的准确传达, 但译文生涩, 大量注释影响了读者接受; 而汪榕培的翻译则属于交际性翻译, 表达清晰流畅, 更符合英语读者习惯[4]。李乐男则专门针对《逍遥游》关键词的英译, 对比了冯友兰与沃森的译本, 分析了二者在核心哲学概念处理上的差异[5]。

近年来, 还有学者开始关注副文本在译本重构中的作用。如林家新与徐坤沛研究了沃森《庄子》英译本中的厚翻译策略, 分析了副文本如何帮助重构庄子的海外形象, 并指出沃森译本中的副文本具有简洁性和灵活性等特点,

对其成为翻译经典起到了重要作用[3]。

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逍遥游》英译提供了多元视角，但多数研究或侧重于理论应用，或局限于具体语言现象的对比，未能充分关注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之间的系统性关联。本文则从目的论出发，将冯友兰与沃森的《逍遥游》译本置于更为宏观的翻译目的框架下进行考察，以期揭示两者翻译策略差异背后的深层动因。

### 3. 翻译目的论与译本概况

#### 3.1 翻译目的论框架

翻译目的论 (Skopos Theory) 是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由赖斯 (Katharina Reiss) 和弗米尔 (Hans Vermeer)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翻译活动的整体框架由其目的决定，这一观点对传统的“对等”为中心的翻译理念带来了深远影响[6]。目的论主要包括三大原则：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

- 目的原则是目的论的核心原则，指翻译行为由其目的决定，即“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6]。翻译目的通常来源于译者、翻译发起者、读者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

- 连贯性原则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的语内连贯标准，即译文在译入语文化背景中应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能够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 忠实性原则指译文与原文之间应存在语际连贯，即译文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形式和风格。

在三大原则中，目的原则居于首位，其他两个原则服从于目的原则。这一理论框架特别适用于典籍英译研究，因为典籍翻译往往涉及复杂的文化背景、哲学概念和文体特征，译者必须根据翻译目的做出种种策略抉择。

#### 3.2 冯友兰与沃森译本概况

冯友兰与沃森的《逍遥游》译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呈现出迥异的翻译风格。

冯友兰译本(1948)出自中国哲学家之手，是其《中国哲学简史》的组成部分。冯友兰集哲学家与翻译家于一身，其翻译《逍遥游》的主要目的是哲学学术阐释——向英语世界系统介绍庄子哲学思想，纠正以往译本中的误解。为此，他的译本特别注重概念的准确性和思想的系统性，大量采纳晋人郭象的注疏[4]，并在附录中详细论述庄子的哲学观点。冯译本主要

面向学术圈和哲学研究者，其翻译策略紧密服务于学术传播目的。

沃森译本(1968)则由美国汉学家完成，属于其全译本《庄子》的开篇之作。沃森的翻译目的更侧重于文学经典传播，力图使《庄子》成为英语世界中的文学经典。[7]他运用“厚翻译”策略，通过导言、注释等副文本为读者构建丰富的文化历史语境[3]，但同时保持正文的流畅性与文学性。沃森译本定位的读者群体更为广泛，包括文学爱好者、普通读者以及汉学研究者，这种定位直接影响了他的翻译策略选择。如表 1 所示：

表 1. 冯友兰与沃森译本基本情况对比

比较维度	冯友兰译本	沃森译本
译者身份	中国哲学家	美国汉学家
出版时间	1948 年	1968 年
翻译目的	哲学学术阐释	文学经典传播
目标读者	学术圈、哲学研究者	文学爱好者、普通读者、汉学研究者
整体特色	学术性强、注重概念准确性	文学性强、注重可读性
文本构成	正文+大量学术注释+附录	正文+选择性注释+导言

### 4. 目的论视角下《逍遥游》译文对比分析

#### 4.1 基本哲学概念的翻译策略

《逍遥游》中包含众多核心哲学概念，如“逍遥”、“游”、“无己”、“无功”、“无名”等，这些概念的翻译直接关系到庄子哲学思想的传达。根据目的论，译者对这些概念的处理策略深受其翻译目的的影响。

冯友兰以哲学学术阐释为首要目的，对基本哲学概念主要采取直译加注的方式，力求准确传达庄子哲学的原始意义。例如，对于篇名“逍遥游”，冯友兰译为“The Happy Excursion”（快乐的远游），这一译法虽未能完全传达“逍遥”的超然意境，但抓住了庄子哲学中追求精神自由与愉悦的核心内涵，且符合学术翻译的准确性要求。对于文中的关键概念“无己”、“无功”、“无名”，冯友兰分别直译为“No-self”、“Non-action”、“Non-recognition”，并在注释中详细解释这些概念在庄子哲学体系中的具体含义[4]。

相比之下，沃森以文学经典传播为目的，对哲学概念的处理更注重可读性与接受效果，多采用意译策略。他将“逍遥游”译为“Free and Easy Wandering”（自由自在的漫游），这一译法通过“Free and Easy”两个词的连用，

既传达了“逍遥”的自由意味，又保留了文章的文学意境，更容易引起英语读者的共鸣。对于“无己”、“无功”、“无名”这一组概念，沃森则分别译为“free himself of self”、“free

himself of deeds”、“free himself of name”，[3]使用英语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虽在哲学精确度上有所牺牲，但大大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如表 2 所示：

表 2.基本哲学概念翻译对比

哲学概念	冯友兰译本	沃森译本	差异分析
逍遥游	The Happy Excursion	Free and Easy Wandering	冯译侧重精神愉悦，沃译强调自由状态
无己	No-self	Free himself of self	冯译直指哲学本体，沃译动态描述过程
无功	Non-action	Free himself of deeds	冯译保留道家术语，沃译通俗化处理
无名	Non-recognition	Free himself of name	冯译强调认知维度，沃译侧重社会身份
圣人	Sage	True Man	冯译沿袭传统译法，沃译创新以求生动

从目的论角度看，两者的策略差异正体现了不同翻译目的的要求。冯友兰服务于学术研究目的，必须确保概念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而沃森着眼于文学传播目的，则需优先考虑读者的理解与接受。

#### 4.2 寓言故事的翻译处理

《逍遥游》运用了大量寓言故事来阐释深奥的哲学思想，如鲲鹏变化、蜩与学鸠笑鹏、尧让天下于许由、肩吾问于连叔等。对于这些寓言故事，两位译者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冯友兰对寓言故事的翻译坚持学术性原则，注重文化细节的保留和哲学寓意的准确传达。在“鲲鹏变化”这段著名寓言中，他对“北冥”、“南冥”、“天池”等地理概念进行了详细考证，将“北冥”译为“Northern Sea”（北海）的同时，通过注释说明这是“the Dark Sea, meaning the North Pole Ocean”（暗海，指北极海洋），并引用《庄子》其他篇章及相关注疏来解释这一意象的哲学含义[8]。这种处理方式虽然确保了学术精确性，但大量注释穿插也影响了阅读的连贯性，对普通读者构成了一定挑战。

沃森则着眼于寓言的叙事性与文学价值，采用故事化改写策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他同样翻译“鲲鹏变化”，但将重点放在故事的戏剧性和形象性上，对“北冥”简译为“Northern Darkness”（北方黑暗），未加过多考证性注释，而是通过生动的语言描绘鲲化为鹏的壮观景象[3]。对于寓言中出现的“蜩与学鸠”等形象，沃森运用英语文学传统中的对应意象“cicada and little dove”（蝉和小鸽子），并通过拟人化手法表现它们嘲笑大鹏的生动场景，使译文更具文学感染力[8]。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涉及历史人物和神话形象的寓言，如“尧让天下于许由”、“肩吾问于连叔”等，冯友兰坚持历史考证路径，对

人名、地名多采用音译并附加详细注释；而沃森则更注重故事的叙事功能，有时甚至会简化复杂的历史背景，突出故事的核心情节[9]。这种差异在目的论框架下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不同的翻译目的导致了对原文不同层面的侧重。

#### 4.3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

文化负载词是典籍翻译中的难点，尤其在《逍遥游》这类富含中国文化特质的文本中更为突出。根据目的论，译者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策略直接反映其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定位。

冯友兰对文化负载词主要采取异化策略，以保留中国文化特质并确保哲学概念的准确性。例如，对于《逍遥游》中出现的“宋荣子”、“列子”等历史人物，冯友兰一律采用音译（“Song Rongzi”，“Liezzi”）并附加详细脚注，介绍这些人物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庄子哲学 discourse 中的象征意义[4]。对于“彭祖”这样的长寿象征，他不仅音译为“Peng Zu”，还在注释中说明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帮助西方学术读者理解其哲学寓意。

沃森则采取灵活变通的策略，根据上下文和文化重要性程度区别对待。对于关键文化意象，他同样使用音译加注的方式；但对于次要文化元素，则倾向于归化翻译或创造性改写，以提升阅读流畅度。例如，对于“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描述，沃森既保留了“Mount Kuaye”的音译，又通过英语文学中常见的神仙形象来类比，帮助读者建立联想[1]。对于“庖人”、“尸祝”等表示职位的词语，他使用英语中的对应词汇“cook”和“priest”进行意译，仅在必要时附加简短说明[1]。

从目的论三原则来看，冯友兰的翻译更注重忠实性原则，尽可能忠实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和哲学内容；而沃森则更注重连贯性原则，确保译文在英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两者策略各有侧重，均服务于各自的翻译目的。

## 5. 讨论：翻译目的与译本接受

通过对冯友兰与沃森《逍遥游》译本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翻译目的如何直接影响译者的策略选择，进而塑造译本的整体风貌与可能接受的读者群体。

从目的论视角来看，冯友兰的哲学学术阐释目的导致其译本呈现出鲜明的学术型翻译特征：大量使用注释、附录等副文本，注重哲学术语的一致性，强调文化细节的保留。这种翻译策略非常适合目标读者——学术界和哲学研究者的需求，能够为他们提供准确、全面的庄子哲学解读。正因如此，冯译本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实现了其既定的翻译目的。然而，这种学术型翻译也存在一定局限，过多的注释和学术性语言使得普通读者难以顺畅阅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庄子思想的更广泛传播。

沃森的文学经典传播目的则使其译本呈现出文学型翻译特质：注重叙事流畅性，运用生动的文学语言，适度简化文化背景，增强文本的可读性。这种策略成功地将《庄子》推向更广泛的英语读者群，使其不仅被视作哲学经典，更被当作文学瑰宝来欣赏。沃森通过“厚翻译”策略，在正文流畅性与学术准确性之间取得了巧妙平衡——导言和注释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而正文则保持了文学作品的生动与美感[3]。这种翻译使《逍遥游》在英语世界获得了文学经典的地位，实现了译者的传播目的。

这两种翻译路径本身并无高下之分，而是适应了不同的传播需求和读者群体。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冯友兰与沃森的《逍遥游》译本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可借鉴的典籍外译模式：学术型翻译确保思想的准确传达，维护文化本质；文学型翻译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扩大文化影响。理想的典籍外译生态应当包容这两种模式，使其在各目的读者群体中发挥独特作用。

对于当代典籍翻译实践而言，这一研究启示我们：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前，必须明确自己的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定位，进而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10]无论是侧重学术性还是文学性，只要符合翻译目的，能够有效实现跨文化传播的预期目标，便都是成功的翻译实践。

## 6. 结论

本文基于翻译目的论，对比分析了冯友兰与沃森的《逍遥游》英译本在基本哲学概念、寓言故事及文化负载词等方面的处理策略。研

究发现：

首先，冯友兰以哲学学术阐释为目的，其翻译策略紧密服务于这一目的——通过直译哲学概念、详注寓言故事、异化文化负载词等方式，确保了庄子哲学思想的准确传达，使译本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次，沃森以文学经典传播为目的，因而更注重译文的文学性与可读性——通过意译哲学概念、故事化改写寓言、归化文化负载词等策略，增强了译本的阅读体验，使《逍遥游》作为文学经典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接受。

这两种翻译路径印证了目的论的核心观点：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这一研究启示我们，典籍英译不应寻求统一的翻译标准，而应根据不同的传播目的和目标读者，采取多元化的翻译策略。对于旨在促进学术研究的翻译，可借鉴冯友兰的学术型路径；对于旨在扩大普通读者群的翻译，可参考沃森的文学型路径。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如何在不同翻译目的指导下，构建更系统的典籍翻译策略体系，以及如何通过多元翻译路径的互补与协作，更有效地推动中国哲学典籍的世界性传播。同时，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可从其他视角继续深化《逍遥游》英译研究，不断丰富我们对中国典籍外译规律的认识。

## 参考文献

- [1]吴瑜.《逍遥游》中哲学意象的英译研究[D].浙江大学, 2013.
- [2]唐嘉俐.隐喻理论视角下的《庄子》英译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 2022.
- [3]林嘉新, 徐坤沛.副文本与形象重构: 华兹生《庄子》英译的深度翻译策略研究[J].外国语, 2022, 45(2), 111-120.
- [4]王敏.典籍英译中的“博弈论”——从关联翻译理论看《庄子·逍遥游》两家英译之个案研究[C].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7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6, 400-413.
- [5]李乐男.《逍遥游》关键词英译对比——以冯友兰和华兹生英译本为例[J].现代语言学, 2021, 9(1), 47-53.
- [6]Vermeer, H. J. 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ranslation Theory[M]. Amsterdam: Rodopi, 1978.
- [7]顾钧.华兹生的《庄子》英译[N].中华读书报, 2012年08月08日, 17版.
- [8]孟元.从《逍遥游》英译本对比看典籍翻译

策略[J].海外英语, 2023 (10), 31-33.  
[9]刘艳荣.目的论视域下《论语》英译本之翻译策略对比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 2015.

[10]姜海清.翻译学中的功能主义——目的论[J].社科纵横, 2005 (06), 247-249.